

朱熹的《论语集注》研究

兼论《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

周元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熹的《论语集注》研究

兼论《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

周元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的《论语集注》研究:兼论《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 / 周元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782 - 8

I. ①朱… II. ①周… III. ①儒家 ②《论语集注》—研究
IV. ①B22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33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 彪
特约编辑 韩国茹
责任校对 侯 玲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论语》作为一部影响中国乃至东亚至深至广的经典，自成书起就有无数经学家为之作注。在众多《论语》注释之中，最富有创见、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朱熹的《论语集注》。《论语集注》作为《四书章句集注》之一，其地位和社会影响也伴随着朱熹理学和《四书章句集注》的改变而改变。自元代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考的指定教材和标准答案，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考，《四书章句集注》主导中国思想文化的制高点近七百年，而且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朱熹理学思想远播至朝鲜、日本等国，一度成为东亚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论语集注》作为南宋形成的《四书章句集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形成之日始，就得到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由于其具有宋代新儒学思想，还由于它是对当时各种学派思想融会贯通的成果。它不仅总结了自汉代至宋代以来《论语》注释的杰出成果，而且直接延续了孔孟以来的儒学传统，在对宋代儒释道融合批判的基础上，从注释传统经典中开创出理学的新意，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在元明清三代，《四书集注》作为政府制定的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自然是所有士人研读的对象。时至今日，《四书》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作，更是了解中国学术史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论语集注》作为《四书》的组成部分以及理学思想的代表作，理应受到学术界广泛、持久、深入的关注。然而，近年来学界对《论语集注》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这与《论语集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鉴于本书将从解释学角度对《论语集注》进行研究，文献综述将分两部分阐述：一、《论语集注》的研究现状；二、朱熹诠释思想的研究现状。

一 文献综述

(一)《论语集注》的研究现状

近十年来,有关《论语集注》的学术成果大致可从三方面概括:一是从史学角度研究《论语》著述,部分涉及《论语集注》;二是从训诂学、文献学等角度,侧重将《论语集注》与其他《论语》注疏相比较;三是从哲学、诠释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或者《四书》体系,牵涉《论语集注》研究。

1. 从史学角度研究《论语》及其注疏,涉及《论语集注》

2006年在台湾发行了日本学者松川健二主编的《论语思想史》的译本,该书早在1994年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对《论语》在东亚诠释与传播的历史进行了整理。该书是一部集合十八位学者之力而成的论文集,全书以时空为界,共分四部分:一,汉魏、六朝、唐之部;二,宋元之部;三,明清之部;四,朝鲜日本部。这本《论语思想史》堪称论述《论语》在东亚传播的通论性学术著作。正如林庆彰在《译序》中所说:“以五百页的篇幅,能呈现《论语》一书在中国及其周边的传播历程的,本书为最重要的一本。”^①在该书第二部分第六章,松川健二以《朱熹的〈论语集注〉——理学的成熟》为题详细考察了朱熹对《论语》中“仁”的发展。该文从《论语》中三章樊迟问仁谈起,分析朱熹在《子路篇》注“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时引胡氏语,曰:“樊迟问仁者三,此最先,先难次之,爱人其最后乎!”作者认为这正体现了朱熹将“仁”抽象化的特点。接着作者通过朱熹对《论语》中有关“仁”的注释,分析了朱熹与程颐对“仁”字理解上的异同,指出朱熹对程颐的解说“以全面尊重为基本态度”,同时对程颐的解说又有批判的地方。作者认为,朱熹正是“借着对程颐的批判中清楚地形成‘仁’概念的纯化志向,……作为‘理’的‘仁’,当然必须说是成熟的表现。”^②

唐明贵于2009年出版了《论语学史》,“理清并展现了《论语》学

^① 松川健二编:《论语思想史·译序》,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② 松川健二编:《论语思想史》,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30—331页。

发展的基本线索，探讨了《论语》学的演变与学术思潮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不同时期的各个流派在《论语》学的诠释与儒学的建构方面的学术特色与思想创新作了系统阐述”^①。该书第五章系统阐述了宋代《论语》学发展的情况，认为宋代《论语》学既有承袭汉唐遗风的训诂章句之学，以邢昺的《论语注疏》为代表，又有注重义理的《论语说》，以程朱及其弟子等理学家为代表，除此而外，又有刘敞的《论语小传》、王安石的《论语全解》、王若虚的《论语辨惑》等非理学家的注疏。其中第四节以“博采众说，通经明理”概括了《论语集注》的注释特点。通过对宋代《论语》学的分析，可知，宋代《论语》学的蓬勃发展为《论语集注》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无限融合创新的可能性，《论语集注》产生在南宋时期绝非偶然。

除以上两部通论《论语》学史的著作外，一些研究元明清三代的《论语》或者《四书》注释史的成果不可避免地涉及《论语集注》。如：研究元代《四书》学的有陆建猷与周春健，研究清代《论语》注释的有朱华忠和柳宏。陆建猷以《〈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为题，把《四书》看做一个整体，不仅论述了《四书》形成的历史进程、经注关系、著作理念、理学思想等，而且阐述了南宋学者对《四书》的研究和应用。周春健以《元代〈四书〉学研究》为题，从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学术师承、南北学派等方面对元代《论语》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朱华忠的《清代〈论语〉简论》采用综论和个案分析的方法，梳理了清代《论语》学的发展脉络，以颜元、王夫之、陆陇其、翟灏、刘宝楠、康有为等为例对清代《论语》诠释情况做了个案分析，具体展示了清代《论语》研究的特点。柳宏以《清代〈论语〉诠释史论》为题，力求理顺清代《论语》诠释的史实和线索，同时将清代经学史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探讨和把握。他们均从史学角度对《论语》注疏展开深入考察，该类研究主要以时间主线展开，侧重于注释文本之间的总体分析，鲜有从《论语集注》自身的内在学理层面进行剖析。

2. 从训诂学、文献学角度研究《论语》注，侧重于比较《论语集

^① 唐明贵：《论语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注》与其他注解在训诂章句上的异同。

由于近年来该类研究论文较少，故将近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罗列如下：

陈焕良从校勘文字、分析句读、注释字音、解释词义、考证名物、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串讲文意、分析篇章结构九个方面以举例的方式说明了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情况。^① 刘志刚在论文《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的训诂学与义理学》中指出，朱熹义理之学渊源自孔孟，孔子在《论语》中对仁、礼、政等名词的回答，常常是从义理出发，而孟子引用六经也常常采取以意逆志的方式，后来王弼、何晏等注书也采取义理解经的方法。作者认为朱熹的义理之学不是突变，而是渐渐演变而成。作者将《四书集注》的训诂特色归纳为：力求符合原意，简明扼要，一扫汉唐义疏繁冗，克服宋儒空衍义理。^② 陈绂从注点、注释角度、训诂方式、对原典的理解等方面对《论语郑氏注》和《论语集注》做了对比。^③ 杨逢彬对《论语》中“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以及“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的诸家注释做了比较，认为朱注对“何有于我”的解释不确。^④ 通过对比，研究者突出了朱熹《论语集注》以义理见长的特点，同时也表现了朱熹《集注》绝非“空衍义理”，他对前人的训诂仍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但是，由于朱熹的训诂往往注重“义训”，所以有些字词的训诂从现代的文字学角度观察，难免有不合文字古义的例子。

在博士论文中，不乏也有对《论语》注疏进行文字学研究的，比如赖积船的《〈论语〉与其汉魏注中的常用词比较研究》，同名著作已于2007年出版。

① 陈焕良：《训诂在〈四书集注〉中的运用》，《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② 刘志刚：《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的训诂学与义理学》，《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③ 陈绂：《论语郑注与朱注的比较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④ 杨逢彬：《论语“何有于我”解——兼论所谓不难之词》，《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 从哲学、诠释学角度研究《论语集注》

近年来内地和港台地区有些学者对朱熹的《论语集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该方面的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发表论文的形式。由于受论文形式的篇幅所限，各位研究者的关注点各有侧重，多以《论语集注》的某章节或某个范畴为例，借以阐述朱熹的诠释思想。方旭东从《论语》的“颜渊问仁”章展开对汉学、宋学诠释的探讨。^①张崑将从朱熹对此章的诠释出发，分析了中日儒者对朱熹的解经原则的批判，并指出后儒的解经方法仍然无法解决经典解释的歧异性。^②白奚以孔子的“仁”为主轴，探讨二程与朱熹对“仁”的解释，从程朱“以体用言仁”、“以生意言仁”、“心之全德”三个层次论述程朱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发展。^③何俊以《论语·学而》篇首章的四种诠释为例，论证了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他认为朱熹以训诂为基础，以义理为归宿，融合了汉学训诂与宋学义理，以经典诠释的方式使宋代儒学在方法和思想两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④劳悦强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出发，论述了朱熹的诠释学。^⑤刘笑敢以《论语集注》为例，提出“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概念，强调在一般的经典诠释中，有“两种定向”、“两个标准”。朱熹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形式与体系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⑥

与中国学者普遍采取发表论文的形式不同，国外出版了两部《论语集注》的解释学研究的个人专著。一是北美学者伽德纳（Daniel

① 方旭东：《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争——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例》，《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张崑将：《朱子对〈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诠释及其继起争议》，载黄俊杰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上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59—211页。

③ 白奚：《二程与朱子对“仁”的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载黄俊杰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上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37—259页。

④ 陆敏珍、何俊：《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哲学研究》2006年第7期。

⑤ 劳悦强：《从〈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论朱熹的诠释学》，载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85页。

⑥ 刘笑敢：《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Gardner) 在 2003 年出版的《朱熹的〈论语〉解读：经典、注释、经典传统》(*Zhu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该书通过对朱熹的《论语集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的比较,进一步阐明了朱熹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方式。伽德纳将两部著作分门别类地归入学、仁、礼、政、君子这五个主题之下,将何晏和朱熹的注释著作并列起来对比研究,由此他注意到两部著作独特的解经策略和诠释学关注。伽德纳通过对朱熹经典诠释的研究,阐明了解经与哲学紧密的互动关系。另一本著作是澳大利亚学者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在 2003 年出版的《“述”者与“作”者:〈论语〉的注者和注释》(*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分别考察了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朱熹的《论语集注》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四部重要的《论语》诠释著作。该书特点是将诠释学的理论与《论语》诠释史文献紧密结合。该书的第三部分用三章的篇幅分析了朱熹《论语集注》的哲学意义,揭示了朱熹经典诠释和儒家工夫论之间的联系,这是中国诠释学的独特性之一。

如上所述,研究者大多为了梳理和挖掘朱熹的诠释学思想,把《论语集注》当作朱熹借以表达其诠释思想的个案,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论语集注》的研究,从中找出与西方诠释学理论接轨的诠释学思想。然而,事实上,朱熹对《论语》文本内容本身的关注超过了对《论语》诠释形式和诠释原则的关注,所以从文本内容上整体把握《论语集注》非常重要,即尽量从《论语集注》的文本中解读其诠释思想比依据诠释理论去解剖、分解《论语集注》文本更符合朱熹本人的诠释理念。

近年来朱熹诠释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朱熹诠释思想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下面对相关研究做一概括。

(二) 朱熹诠释思想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1. 综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蔡方鹿在《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①、《朱熹经典诠释之我

^① 蔡方鹿、蒋小云:《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见》^①、《朱熹理学与经学》^② 等系列论文中分析了朱熹经学、理学、哲学的关系，并从宏观上梳理了朱熹的经典诠释思想，认为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了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形成较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潘德荣在题为《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③ 一文中，从诠释的根据、目的和方法三方面，认为“理”是朱熹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意、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的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融合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解释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他在另一篇题为《阅读与理解：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诠释思想之比较》^④ 的论文中，比较了朱熹和施莱尔马赫的诠释思想。在他看来，朱熹将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视为经典解释的第一目标，但他认为理解文本的意义只能被视为理解作者原意的基础，读者还要顺着文本的脉络思考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便理解圣人的原意。而施莱尔马赫则把揭示作者的原意视为解释的根本目的。李清良在《朱子对理解之蔽的认识——兼论中西阐释理论的一项本质区别》^⑤ 一文中认为朱熹论理解之蔽可分两类：“气禀之偏”和“私欲之累”。与之相对应，朱熹提出两种解蔽方法：“致知明理”和“涵养体察”。朱熹一方面承认了“理解之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通过循环往复的长期修养工夫最后可以去除理解之蔽。朱熹的说法虽然浑然贯通却不笼统含混，展现了中国古典阐释理论的圆融性。伍安祖认为，深入反思朱熹的古经哲学和批注功夫，不仅可以看出经书对朱熹的意义，而且可以看出，朱熹对经典的解释一方面受时代脉络的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遵循了该经典本身原有的基本意涵

① 蔡方鹿：《朱熹经典诠释之我见》，《文史哲》2003年第2期。

② 蔡方鹿：《朱熹理学与经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④ 潘德荣：《阅读与理解：朱子与施莱尔马赫诠释思想之比较》，载黄俊杰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下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35—452页。

⑤ 李清良：《朱子对理解之蔽的认识——兼论中西阐释理论的一项本质区别》，载黄俊杰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下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53—474页。

和规范。^① 陈立胜从读书着手，分析朱熹的读书与诠释的关系。^② 吴展良在《朱子的认识方式及其现代诠释》^③ 一文中，强调朱熹求知读书的基本动机是学习所以为人处事之道，所以他设定的为学的终极目标是“效法圣人”以合乎天道。因此，在吴展良看来，现代学者从西方认识论和世界观的角度分析朱熹，是不符合朱熹思想的。

另外，近年也有专门研究朱熹的经典诠释的成果，如曹海东的《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尉利工的《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这两篇博士论文都从朱熹经典诠释的实践出发，对朱熹经典诠释思想进行了梳理。总起来说，大多学者在综论朱熹经典诠释思想时，偏重于以西方解释学理论为参照，突出朱熹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的差异，同时对朱熹的解释学进行了现代解释学的架构。有的学者提出朱熹解释学是本体论诠释学体系。然而，西方本体诠释学与中国儒、释、道的世界观及认识观虽有相近之处，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审视双方学说的内容，仍将发现不少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数相当多，直接联系到中西思想的根本异同，因此所涉及的问题可谓无远弗届。”^④

2. 综论朱熹《四书》体系的诠释思想

《四书》是朱熹思想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朱熹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注释，因此《四书》体现了传统经学和理学的统一，体现了传统注经方式与开创新儒学体系的统一。所以近年来很多学者侧重从研究《四书》体系入手，对朱熹诠释思想进行研究。如：周光庆认为，朱熹的《四书》解释方法具有系统性，既是研究儒学的方法论，又是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理”的方法论。由此出发，作者详细分析了朱熹《四书》研究中的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⑤ 朱汉民撰文《言·意·

① 伍安祖：《跨文化的阅读：朱熹的经典注解与诠释的终极性》，载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76页。

② 陈立胜：《朱子读书法：诠释与诠释之外》，载李明辉编《儒家经典诠释方法》，乐学书局2003年版，第207—234页。

③ 吴展良：《朱子的认识方式及其现代诠释》，载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反向格义与全球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194页。

④ 吴展良：《圣人之书与天理的恒常性：朱子的经典诠释之前提假设》，<http://www.66wen.com/01zx/zhexue/zhexue/0694/37052.html>。

⑤ 周光庆：《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孔子研究》2000年第6期。

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①、《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②，认为朱熹主要通过运用“语言—文献”与“实践—体验”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以实现对《四书》诠释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双重要求。另外他在《朱熹〈四书〉学与儒学工夫论》^③一文中提出，《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内含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体系，朱熹的《四书》学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肖永明认为朱熹诠释《四书》，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力求经文本义，避免穿凿杜撰，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成果。^④刘述先结合朱熹《四书集注》和《易经》诠释的相关问题，提出朱熹虽擅长分析，但仍是将知识、存在、价值融贯为一体的中国哲学传统；朱熹虽强调认知，但终极目标还是圣学的实践，不是建立客观知识系统。^⑤蒙培元从方法论角度论述了朱熹注释《四书》的特点：（1）重视文字解释，揭示本来意义；（2）拓展解释空间，确立普遍原理；（3）运用分析方法，建立分层理论；（4）转换解释向度，赋予新的意义；（5）非建构的建构：形上学的重建及“限制”；（6）回到直觉体验，追求圣人境界等。^⑥黄俊杰以朱熹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论证了朱熹的诠释和哲学建构之间的交融性和逸脱于经典原始脉络的紧张性。他提出以“视域融合”迈向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的动态平衡，求得“对话的”经典诠释法和“历史的”解释法之间的平衡。^⑦梁中

① 朱汉民：《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② 朱汉民：《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求索》2004年第1期。

③ 朱汉民：《朱熹〈四书〉学与儒学工夫论》，《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肖永明：《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⑤ 刘述先：《“朱熹对〈四书〉与〈易经〉的诠释”重探》，载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87页。

⑥ 蒙培元：《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载刘笑敢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107页。

⑦ 黄俊杰：《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和在题为《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①一文中重点分析了朱熹解释学的三大原则：“求本意”的原则，即身居道统而求道之当然、本然之意；“实理实情”的原则，即文本解释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则；“以身解经”的原则，即“为己之学”与“力行”的原则。梁中和还从“解释与理解者”和“被解释与被理解者”之关系等角度，对一般意义的解释学与朱熹解释工作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另外，高雄师范大学的柯梅妃在康义勇教授的指导下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研究——以诠释传意方法分析》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全面运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分别从诠释前视域、诠释视域、诠释体例与原则、诠释方法论、意义的生成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四书章句集注》。由于该文对本书的写作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下面就对其主要内容做一概括性叙述。诠释前视域主要阐述了《四书章句集注》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朱熹的学思历程等。诠释视域主要从诠释目标、理解的循环、诠释视域的融合三方面阐述。诠释体例主要分析了章句体和集注体的特点。诠释原则有经传相分、义理与训诂结合等。诠释方法论概括为语言逼近法、分析与综合、历史诠释法、心理诠释法等。意义的生成是全文的重中之重，分为上下篇，上篇阐述了《四书章句集注》的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道统论，下篇主要从理想人格、人生伦理、历史论三方面论述意义的生成。就目前所看到的论述朱熹《四书》诠释的材料，就章节安排的形式上看，该文最为系统地运用西方解释学分析朱熹《四书》思想。就全文内容而言，本文虽然运用了解释学理论剖析《四书章句集注》，但还是全面详尽地对《四书章句集注》的写作背景、章句集注形式和理学内容做了详细阐释，同时归纳了《四书章句集注》的诠释方法、诠释体例、诠释原则等。可以说，该文为从西方解释学角度研究中国经典注疏提供了范例。由于全文将《四书章句集注》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西方解释学的解析，所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各自的特点并不能得到凸显。另外，把《四书章句集注》直接比照西方解释学，

^① 梁中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http://www.confuchina.com/09%20xungu/sishu%20jieshi.htm>。

也有背离理学、经学乃至儒学等大传统的风险，不能体现出朱熹诠释经典与中国古代其他注家的相异之处。这也是借鉴西方学说独立分析中国著作或者思想家的弊端所在。

以上成果都是从《四书》文本出发，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活动做系统、深入地研究，在朱熹诠释思想方面达成了大量共识。如：朱熹诠释的目的是“圣学的实践”，不是创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诠释的立足点是“为己之学”，不是学习知识；诠释方法大致有两个层面：语法的、文意的、语言—文献的和心法的、体悟的、实践—体验的方式；朱熹对《四书》的诠释具有宗教性，融合了知识和宗教的特征等。我们不妨把这些共识与中国哲学异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对照一下。张岱年先生把中国哲学的特色归纳为六个：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非依附宗教。^① 对照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朱熹诠释学思想的特点无一不与中国哲学的特点吻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将朱熹放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他就是一个毫无特色的思想家？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根源，目前学界达成的大量共识是在西方哲学、西方解释学的参照下得出的，而不是把朱熹放在他所处的理学环境中，去寻找朱熹诠释经典的特色。正如吴展良所说，“当代有关朱子与其经典诠释的研究，都受到西方当代存有诠释学所强调的‘历史性’、‘主观性’与‘差异性’的影响。从而对于朱子解经时所重视的‘本文原意’、‘圣人本意’与天理的一贯性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新看法的确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人解经时所受到各自的存有处境、世界观及认知方式的限制，然而却也使我们对于传统上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连续性与恒常性内涵这一方面的认识有所不足。”^② 缘于此，本书试图将《论语集注》放置中国哲学传统之中，切实着眼于经学与理学之间的连续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发掘朱熹《论语》注释与前人的异同，突出表现朱熹在继承经学传统的同时是如何创立其理学思想的。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② 吴展良：《圣人之书与天理的恒常性：朱子的经典诠释之前提假设》，<http://www.66wen.com/01zx/zhexue/zhexue/0694/37052.html>。

综上,近年来学界对《论语》学和中国经典诠释研究的蓬勃兴起,为本书的研究搭建了广阔的学术平台,提供了必要的学术资源。从解释学角度研究《论语集注》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第一,中国哲学家把经典注释作为表达思想的方式,所以现代中国学者正在试图借鉴西方解释学理论,深入考察注经和哲学思想创新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尝试建立中国解释学理论。在此学术背景下,很多学者已经通过对《论语》、《孟子》等经典诠释的探索,力求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新价值。第二,目前学界从解释学视角研究《论语集注》多数依附于对《四书》的整体研究,尽管《四书》是一个整体,但不可否认,《论语集注》作为《论语》诠释史中重要的著作,也应在《论语》诠释史的脉络中加以研究。我们在加强对《四书》整体研究的同时,也应鼓励对《论语》、《孟子》等个案的诠释研究,形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个案研究和《四书》整体研究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第三,目前从解释学角度对《论语集注》或其他经典诠释的研究主要以论文的形式体现。由于论文形式的篇幅所限,不得不从经典诠释著作的某章某节等入手,无形中忽略了对整体内容的关注。第四,由于《论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国外学者往往将之作为研究的重头戏。目前出版的研究《论语》注释的个人专著,多由海外学者捷足先登,在内地却鲜有力作。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分析《论语集注》的文本,揭示《论语集注》对《论语》及其前人注释的继承和发展,进而探讨朱熹《论语集注》对当代解释学理论的启发意义。

二 研究目标和特色

本书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三个:

第一,立足于《论语》注释史,突出《论语集注》之“集”诸家注的传统经学特色。朱熹所“集”之“注”不仅包含流传久远的汉魏注,还广泛吸取宋代洛学、湖湘学、新学、苏学等各学派的解说。《论语集注》能够秉承传统注经方式,广泛吸纳他人注解,这无疑是《论语集注》之所以从蓬勃兴起的宋代《论语》解说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第二,《论语集注》作为《四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朱熹

构建理学思想的重要源泉和载体，所以本书必须突出《论语集注》的理学特色。《论语集注》之所以能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一起成为朱熹理学的代表作，受到后世的广泛推崇，原因之一在于其中蕴含了理学思想。换言之，《论语集注》除了广泛集合众家注解之外，还具有超越诸家注释的朱熹理学特色，因而在后世儒学的发展中保持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第三，《论语集注》作为解释《论语》之作，一方面，体现了朱熹对《论语》这部传统儒家经典的理解；另一方面，《论语集注》在选择、融合众家注解时，体现出朱熹对以前的《论语》注释者的看法，所以《论语集注》也是朱熹对前人的《论语》注释的诠释。而且，朱熹在长期注经过程中对解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看法，可以说，朱熹不仅是注经的实践者，还是注经的理论总结者。因此，在传统的经学、理学角度之外，本书试图揭示《论语集注》对当代建构中国解释学的启发性意义。这既是本书的目标之一，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本书的特色有四个：

第一，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论语集注》，避免脱离《论语》注释史的生硬比较。一是把《论语集注》放在《论语》诠释的历史脉络中研究，通过将《论语集注》与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邢昺的《论语正义》相对比，可以看出《论语》诠释逐渐呈现出义理化的趋势，这说明《论语集注》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二是剖析了《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过程与朱熹理学思想形成之间的关联性，既体现了《四书》和朱熹理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又突出了朱熹解释《论语》的动态演进，体现了《论语集注》的历史性。

第二，突出《论语集注》在传承之中创新的特点，也即经学与理学统一的特点。所谓传承是指《论语集注》和其他《论语》注释著作一样，都对《论语》文本进行了音读、训诂、考据的诠释，这是经学传统；所谓创新是指《论语集注》中贯穿了理学思想，赋予《论语》文本以新的时代特征，这是理学精神。《论语集注》是经学和理学相统一的注释之作。因此，在评价《论语集注》时，如果仅强调《论语集注》是对理学思想的阐发，或者仅强调《论语集注》是对《论语》的

注释，都是不全面的。《论语集注》之所以成为《论语》解释的经典就在于朱熹在对传统经学的继承中阐发了新时代的理学思想。

第三，通过对《论语集注》文本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朱熹在注释《论语》时所面临的困境：即，由于《论语》所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思想与朱熹所处时代的理学思想有着很大不同，由此导致《论语集注》中既有以理学视域诠释《论语》文本的现象，又存在着为了贴近《论语》文本而对程子理学话语纠偏的事实，如何协调“唯文本本意是求”的注经理念和融合当时的理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朱熹诠释《论语》文本必须考虑的两个维度。而这种忠于本文和赋予本文以时代新意之间的张力正是现代解释学所揭示的普遍问题，因此本书通过分析《论语集注》的历史形成以及文本内容，试图挖掘出朱熹对现代解释学理论的启发性意义。

第四，本书通过分析后世对《论语集注》的解释，深刻揭示出理论创新对于一部解释经典的著作最终能够成为新经典的重要性。无论汉学家如何从经学角度对《论语集注》横加批判，也不能抹杀《论语集注》在《论语》诠释史的贡献，也不能取代《论语集注》在《论语》注释史中的地位。这说明对经典的“解释”要想成为解释的“经典”，仅仅忠于本文还是不够，还需要有时代新意，特别是理论的创新。

三 研究内容和方法

《论语集注》是集大成之作，共采用了从汉至宋的三十余家注。同时，《论语集注》是《四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论语集注》明确体现了朱熹理学是在经学传承之中进行创新的结果。因此综合研究《论语集注》的经学价值和理学特色是本书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寻求《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立足于《论语》诠释史，通过梳理《论语》及其注释情况，体现出《论语集注》是朱熹吸取传统注经模式，广泛采纳传统注疏以及宋代义理解说的集大成之作。《论语》文本的语录体没有交代对话的语境，时间一久，读者很难还原出孔子与弟子、时人对话的境遇，这为后人对《论语》文本的理解提供了诠释的无限可能。于是出现了何晏